

天津河北文史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

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目 录

七五 十 年四	张太雷在天津河北的革命活动·····张经文 (1)
	“觉悟社”社员代号及其化名·····张经文 (6)
	从“五四”时期的“天津四凶” 忆孟震侯先生·····汪桂年 (8)
四天 十津 周解 年放	金汤桥上红旗飘·····王者师 (13)
	枪炮声声迎解放·····于 方 (18)
	幸福的时刻 永恒的回忆·····房文举 (20)
直 沽 话 旧	天津城垣的修建和拆除·····钟和高 (24)
	英法联军侵扰下的三岔河口·····葛培林 (28)
	李叔同故居的旧貌及其变化·····杨长和 (36)
	河北区界内两大票房·····孙 煌 (40)
	忆北宁国剧社·····常仲荃 (45)
	记三十年代觉民中学的“井尸案”·····刘 砦 (49)
生文 史教 话卫	四十年代学运在“女二中”·····许杏林 (51)
	“二中心”小学六十年·····汪桂年 (61)
	从官医院到市立第二医院·····房文举 (66)
	忆福婴小学和校长许正寰·····岳 丹 (70)
	忆私立“河北中学”·····刘炎臣 (73)
人 物 志	刘清扬先生事略·····王守惇述 刘炎臣整理补充 (76)
	陈省身在扶轮·····刘培震 张立湧 (81)
	我的父亲宫白羽·····宫以仁 (84)
	李实忱天坛说降概要记·····刘炎臣整理 (91)
	从省议长到纱厂经理 记边洁清·····毛金道 (97)

工 商 史 料	河北区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梗概·····孙 煌 (100)
	天津大中华橡胶厂的诞生与发展 ·····薛宾荪 黄胜林 王祖康 (106)
	华夏第一屏·····黄什机 (119)
	北运河之滨的一颗璀灿明珠 ——记天津电子线缆公司的四十六年·····白崇厚 (123)
	河北区的印染工业·····尹树鹏 (130)
画 友 录	陈霏洲师讲授书法·····龚 望 (137)
	孙其峰简介·····王振德 (143)
	爱新觉罗·溥佐简介·····王振德 (147)
坊 巷 采 风	乾隆赐名“老龙头”·····王者师 (150)
	金家窑大街话今昔·····李儒铨 (155)
	河北区几条街巷变化小记·····杨长和 (158)
	天津站新貌·····刘培震 (164)
河北区界内近、现代人物录····· (16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 组织沿革····· (170)	
编后语·····杨武进 (177)	
补 白	(12) (35) (39) (44) (65)
	(83) (96) (99) (157)

“五·四”七十年

张太雷在天津河北的革命活动

张 经 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张太雷英勇就义六十二周年。岁月虽长，但他的精神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

(一)

张太雷于1898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原名曾让，字泰来。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张太雷与瞿秋白是常州府中学堂的同学和好友，他们志趣一致，经常在一起阅读新报刊，探求新知识。他读过《民呼报》、《民主报》、《申报》，也读过《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和《仁学》，对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也很感兴趣，认真研读。

1915年临近中学毕业，因其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参加声讨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斗争，组织宣传抵制日货运动，被校方开除学籍。是年冬，他考取了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备班。

他从1916年春至1920年夏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生活俭朴，成绩优异，他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课余还在《华北明星报》任编辑和英文翻译。张太雷生性活泼开朗，豪迈热情，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强烈的爱国、革命思想。1919年2月，张太雷在河北大马路组织过一个进步团体“社会改造社”，宗旨是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有科学文化的新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天津青年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6月5日，天津学生抗议北洋政府拘捕北京爱国学生，在南开操场誓师讲演；6月10日在河北公园召开群众大会；8

月下旬天津学生到北京天安门请愿，要求惩办济南镇守史马良残酷枪杀回民：10月10日包围警厅通宵达旦，张太雷都和热情的爱国青年战斗在一起。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禁止学生参加运动，张太雷又组织同学掀起了驱冯斗争，因此被校方开除。

(二)

1920年，他以明星报职业为掩护，替第三国际代表作翻译，并参加了陈独秀等人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又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0年9月，谌小岑(觉悟社社员)接受李大钊、陈独秀和第三国际的委派，来天津协助张太雷筹建S、Y(社会主义青年团、Socialist Youth的缩写)。

9月28号(星期五)，在河东“特别二区”大马路(现建国道91号)租赁一家裁缝的楼上，成立了天津第一个S、Y小组。小组共七个人。有胡维宪(觉悟社社员)、吴南如(北洋大学)、陶某(南开大学)和京奉铁路局的冯某等两名职员。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属于北京S、Y中央的地方支部，是以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工人运动为目的，张太雷任书记。会上大家同意办一份报纸。

这份报纸最初定名为《劳报》，每天出版四开一张。谌小岑和胡维宪都是觉悟社社员，五四运动中的积极骨干，早在1919年7月周恩来就曾邀胡维宪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工作。谌小岑在五四运动中一直担任《北洋大学日记》的经理兼记者，所以，张太雷提名谌小岑任经理兼编辑，胡维宪任编辑。

《劳报》于1920年11月20日创刊。版面主要编选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十几家报纸上反映工人运动的新闻。同时，摘译刊登共产国际分发来的小册子上的文章，其内容，大都是报导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性的文章。《劳报》也转载过一些国际上较大的工人运动的消息，还有天津、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铁路、煤矿、纺纱工人生活状况的报导。第四版刊载

文艺作品，有通俗小说、诗歌和散文等。报纸虽小，旗帜鲜明，色彩明快，成为天津乃至北方地区第一份供工人阅读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及国内工人运动的报纸。《劳报》出版后由于文字简练，版面活泼，通俗易懂，内容丰富。所以深受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同时对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出版不到两个星期，就被警察厅长杨以德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禁止发行。

警察厅的查封并没能迫使《劳报》停刊，张太雷、谌小岑、胡维宪等连夜召开会议安排对策。第二天就更名为《来报》（采用英文Labour（劳动）的译音而来）继续出版。后来张太雷又加上一层解释：这份报的宗旨说：“这是意味着抛弃陈旧的过去，争取崭新的未来。”

《劳报》没刊登发行地址。长辛店一位工友来信指出，有人想投稿、通信，没地址不好。因为编辑部既是谌小岑的住处更是S. Y小组所在地，不便公开。所以研究决定在法租界租了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房子，派陶某住在那里，担任出版发行工作。并总结了过去通过邮局直寄和委托“派报社”发行的失误，改变了发行方向，主要寄向外埠有联络的铁路工人集中的地方。又由京奉铁路局冯等二位同志利用铁路方便分送到京奉路和津浦路各站。从而避开了北洋军阀统治者的检查，此后报纸的发行，从来没有发生失误的现象。

《来报》迁至法租界发行出版，减少了些压抑。但因《来报》革命色彩鲜明，终被北洋“警犬”嗅到。天津警察局会同法租界工部局在1921年初的一天，将陶同志拘捕，并没收了全部报纸和留存的刊物，查封了社址。通过张太雷等积极组织营救和马千里先生的多方帮助，陶同志在法租界拘留几小时被释放了出来。

综计《劳报》出版发行了两个星期，《来报》出版发行了也只有四个多星期，这份天津出版的第一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的刊物就此夭折了。（另说：此后，又迁出租界，在马千里的帮助下改出《津报》）。

天津第一个S. Y小组除了出版报刊外，还进行了下列一些活

动：

S. Y小组每星期日例会，都在奥租界(特别二区)大马路裁缝店楼上进行，每次七人都到，无一缺席，每会均由张太雷主持。由于地方狭小凳椅不够，有的站着，有的席地而坐。尤其是他们都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又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都能以理论为武器，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每次例会，大家都坦诚交流彼此了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看法，研究如何深入群众的问题，向工人直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既体会工人深厚的感情又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除此之外，也多次研究如何健全组织和发展组织的问题。气氛十分民主、和谐、热烈融洽。

S. Y小组还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和《共产党宣言》介绍给工人和知识分子，还把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编印成小册子在工人聚居的恒源纱厂、老龙头车站、天津总站和北洋法政、直隶女师等校广泛推销发行。

天津第一个S. Y小组存在两个多月，由于诸事繁忙没能发展新成员。北京曾几次来人出席过小组会议，如赵世炎、瞿秋白、张国焘、何孟雄等，邓培也专程来此，研究唐山铁路南厂成立工会问题。

在《来报》被查封不久，张太雷被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担任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工作。谌小岑调到刚刚成立的华俄通讯社当翻译。这样天津第一个S. Y小组存在两个多月后就停顿了。

(三)

天津第二个S. Y，是1923年3月12日在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恒源纱厂，今第一毛纺厂)附近的字纬路四段12号(今四马路胜天里)建立了以于树德、李峙山(毅韬，觉悟社社员)为书记部正副主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支部。团员十一人，其中包括李腾(天津水产学校学生)、觉吾(久大工厂实习生)、李培良(甲种商业学校学生)、安体诚(北洋法政学堂教员)等，其中不少人是工人工余补

习学校的教员骨干。支部拟定的章程中确定：“本团以研究共产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要求团员要“相信共产主义并具有革命精神”。规定：“本团设执行委员会，内分书记、出版、宣传三部”，各部正副主任均为执行委员。

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地方团改组和改选的通知精神，于1924年3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直隶高等工业学校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男女团员四十九人“由韩麟符担任大会主席。会上选出于方舟、李庚祺、张宝泉、崔溥、王乃宽委员五人。邓颖超、王贞儒、张篱林、卢硕、谢曦五人为侯补委员。4月16日，天津团地委举行第一次会议，拟定了团的活动计划，确定委员分工：于方舟任委员长，李庚祺为秘书，张宝泉为会计，崔溥负责宣传，王乃宝负责教育。

到1924年6月底，团员人数增至六十五人，先后建立了工业学校、法政学校、南开中学、汇文中学、官立中学、达仁女校、师范学校、南开女中、南开大学九个团支部。

10月19日，天津团地委召开大会，于方舟主持并报告“赴粤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情况及右派反动高潮”、“在沪C、P会议案及宣言的解释”，决定改组团地委。会议选出正式委员六人：崔物齐、李志新、汪志清、苏濯、张昌旭、邓颖超。侯补委员宋林藩、阎峻忠、宋林甫。根据鲍罗庭夫人的提议，增设妇女部，邓颖超司其事。

1925年1月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本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按大会决议，于3月16日召开团员大会，改选了新的领导成员。

1989.5.16.三稿



“觉悟社”社员代号及其化名

张 经 文

天津“觉悟社”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成立时有社员二十名(男女各十名)。社员相约：通信、写文章不用原来的姓名，而用抓阄的方法决定每个人的代号。虽然当时社员只有二十人，但为了隐蔽保护自己，代号却是一至五十。社员们在抓得自己的号码后，又根据相应谐音用汉字安排了代名。在以后曾作为自己的笔名应用了相当一段时期，例如李毅韬抓了四十三号，此后就改名李峙山延用到病逝。也有些人的代名则未应用。而张经文是后来加入的，故无代号。社员吴瑞燕代号和化名好长一段均未查到，多次访问其本人，亦因当时年少，其后代号也很少延用，又经过漫长、坎坷的历史长河，早已忘怀。

最近，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一九二〇年“觉悟社”星散后，吴瑞燕在北京“人艺”学习戏剧专业时曾与同仁组织同仁剧社，为了纪念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怀念“觉悟社”周恩来、郭蓬真等大哥大姐们对自己的帮助，故用自己在觉悟社的26的代号为“念六剧社”。故此，我曾多次与本人和熟悉、了解这段历史情况的老同志、老先生们核实，经此一提醒，大都恍然想起认定吴瑞燕代号是26。吴瑞燕在回复我的咨询时说：“经您的提醒，我忽然想起号码应与刘清扬大姐挨着在其后。”这样就更加确切了，这一发现填补了觉悟社社员代号及化名吴瑞燕代号的空白。同时也是对觉悟社七十周年一点奉献吧。

号码	姓 名	化 名
1	邓颖超(女)	章、逸豪
3	周之廉(女)	珊
5	周恩来	伍豪、伍、五

- | | | |
|----|--------|---------------------|
| 9 | 赵光宸 | 奈因(系英文九Nine译音) |
| 11 | 薛撼岳 | 石逸、石遗 |
| 13 | 郭隆真 | 石衫、石珊 |
| 18 | 关锡斌 | 石霸(管易文) |
| 19 | 潘述庵 | 石久(潘世伦) |
| 20 | 胡维宪 | 念豪 |
| 25 | 刘清扬(女) | 念吾 |
| 26 | 吴瑞燕(女) | 念六 |
| 28 | 李震瀛 | 二八(李宝森, 又称振因、大汉、治之) |
| 29 | 马 骏 | 念久 |
| 31 | 李锡锦(女) | 衫逸 |
| 34 | 郑季清(女) | 衫峙(郑岩, 又称寿禄、漱六) |
| 36 | 张若名(女) | 衫陆(张砚庄) |
| 37 | 张嗣青(女) | 衫弃 |
| 41 | 谌小岑 | 施以(谌伊勖, 小、小以) |
| 43 | 李毅韬(女) | 峙山、施珊(施山、山、珊) |
| 50 | 谌志笃 | 武陵 |

以上为“觉悟社”男女社员共二十名。觉悟社还有社友陶尚钊、黄爱(正品)、杨乃贤、韩循华、王卓吾等多人。据一九二三年第一期和第三期《觉邸》刊载的有关文章中, 有“觉悟社”“二十几个社员星散中国大江南北和欧美各洲”及邓颖超等人撰写的《觉悟社社歌》唱的:

世界潮流, 汹涌澎湃, 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 阶级战争, 青年齐努力,

二十几个同志们, 大家携手作先驱。

奋斗是精神, 推翻恶势力。

以上记载, 所指数字“二十几个”, 是包括社员和社友在内的。

从“五四”时期的“天津四凶” 忆孟震侯先生

汪 桂 年

“五四”运动在天津，青年学生是先锋，是中坚；涌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是我国现代史上光荣的一页。这时期，在天津中、壮年人间，也出现些敢于斗争的爱国志士，其中以天津“老乡”马千里、时子周、孟震侯几人为突出。他们是各界联合会的主要成员，他们是教育界、宗教界、报界的代表，又都是教员，有辩才，能讲话。他们几人遇事作为代表对各方交涉，请愿辩论，词气犀利，锐不可当，所以这几人是首批点名被拘捕的。他们又是在警察厅内，出面向杨以德等严重交涉的代表，也就是最使反动地方当局最头疼的人物。反动当局认为他们闹得最凶(厉害)。中国从古来有所谓“四凶”的传说(见《春秋左氏传》)，后世便以为首称最的人为“凶”，“四凶”旧也说是“四伯”(打“头儿”的，称最的)，当时在警察厅内，传唤“谈话”，总离不开马、时、孟、夏(彦藻，字琴西)，杨以德指名道姓地硬说他们有人接受了“钱”，这便有了“四凶”之目。后来被拘的二十几位从检察厅出来后，为保持“五四”斗争精神，发扬国民意志，组织报社，“提倡平民政治，讨论社会问题”，取名《新民意报》，突出地在于“新”字，介绍新思想，提倡新风尚，推广新文风。

《新民意报》是马千里和刘铁庵(名乃扬)就刘孟扬的“晚报社”现成房舍和机器组办的。刘孟扬、乃扬(铁庵)是兄弟，刘清扬是小妹。刘孟扬走入宦途，迫随杨以德，刘孟扬一度曾声明与弟、妹脱离关系，又把自办的《晚报》(连《晨报》、《午报》)交与刘铁庵和董秋圃，刘便办起《新民意报》。董继续办《午报》。《新

民意报》由马千里任主编，刘铁庵任经理，时子周、孟震侯以及当时的青年赵景深和刘嘉俊任撰稿人或编辑。《新民意报》先后发表了周恩来同志写的文稿《警厅拘留记》和《检厅目录》等轰动了天津，影响到各地。刘铁庵原在京津报界活动，在北京办《国强报》任社长，在“五四”运动初期，《国强报》报道运动消息，鼓舞青年斗志，激励群众，齐心协力雪国耻。1919年8月，京津各地学生代表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山东马良镇压爱国运动)，到总统府请愿。刘清扬作为代表之一，与其他代表全体被捕。北京警察厅为分化爱国运动，派人找来刘铁庵，让他领走刘清扬。刘清扬说：“我只知有国不知有家”，拒绝走出拘留所。北京《国强报》发表了刘清扬大义灭亲的新闻，宣传革命青年爱国忘家的气概，激励国人坚持斗争，在舆论界起了很大的影响。后来马、时、孟和刘铁庵办报，四人都是天津人，在天津舆论界有威望，充当了国民的喉舌，在天津人口中于是时、马、刘、孟连称(时年最长)，号“天津四凶”，“凶”者，势不可当之谓也。

“五四”运动，马千里、时子周、孟震侯和夏琴西是在河北原省公署门前被捕的，今值“五四”七十周年之际，追忆当年的印象，应有所记述，作为将来地方史志的资料。马、时在津活动的事迹，已有史料辑录，夏琴西先生在解放后曾任市政协委员。在二三十年代中，长期在商会任秘书长。“五四”后他们因职务关系少有合作，这里便不再多叙。孟震侯先生“五四”后活动较少，又因有病家居，从1928天津设市前便少被人谈起。爰就过去所闻，和自己见到的印象，略作记述，疏漏讹误，在所不免，切望得到知情的同志和先生的亲友给予匡正。

孟震侯先生(1886-1932)，名继鼎，字震侯，家住“河东”原特二区海河东岸大昌兴胡同(临近现进步道口)。少年时接受新教育，便从事教学工作，在普及学校任课。普及学校是“河东”士绅集议创办的，校址在“鸽子集”(今民主道和平安街那里的名称，原址以后改办私立河东中学，现为华安街中学)，由原奥租界当局拨发经费。孟震侯先生在校任课，当时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多办

报刊，介绍新思想，议论时政，孟震侯便也参与新闻事业。天津那时有英人办的英文《泰晤士报》(Times)，并另有汉文《泰晤士报》。熊少豪任总理，孟任记者，有经理的名义。孟以报界记者，交往广，活动多。“五四”爱国运动掀起后，继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便在(1919)6月18日宣告成立，有学、妇、教、报、工商、士绅、宗教各界代表，孟震侯以报界代表被选为评议部主任(商会会长卞月庭、教界和基督教界代表马千里、报界代表刘俊卿任正副会长，时子周、刘清扬几人为评议部干事，另有总务部)，参加游行讲演，抵制日货，不顾反动当局的干涉和禁止，积极开展活动。讲演每天在各宣讲所上下午进行，(河东)吉家胡同地藏庵，原为宣讲所，居民踴跃往听。孟震侯当时以“能讲”、动听，受到听众的欢迎。在河北公园举行的几次大会，他也都参加，给群众极大的震动。“双十”的大游行，孟与时子周等被推为讲演员。在这期间，曾一度发生了北门外竹竿巷万德成棉纱庄违反共同停购日货的议定，有日本某洋行买办邱某，阻挠各界及学生前去质问，因而冲突。北区警署署员牛某捕去代表，引起社会的注意。该号自知理亏，捐资三万元办公益事业，这也由此滋生了传言，导致后来杨以德不断向马、时、孟、夏纠缠所谓“万德成事”。福州日人枪杀我学生事，天津声援福州惨案，组织行动委员会，马、时、孟、夏及宋则久先生等任委员，积极开展抵制洋货运动，不久便发生了东门内魁发成洋广货店勾结日人殴打学联调查委员的严重事件。当时日人逃去，该号经理人等也隐匿。学生将该号一同人带到商会作证，警察厅保安队到商会强行带走，并用皮鞭殴打在门前拥聚的群众。群情激愤，马、时、夏几人被推到省公署请愿，对警察厅长杨以德进行控诉。途中遇孟，孟便随同前往。就在省公署的辕门前，孟震侯便和马、时、夏一同被捕。当时也有学生一同前去，见代表被点名拘捕，便也争与一同被捕。其中有“官立中”同学吴世昌，他对我说是“学长兄”。我曾在《华北新闻》和他同事，他任编辑。他曾经说那时情况：代表们进去交涉，同学们在辕门外等候着。代表刚出来，一伙保安队迎面叫马、时、

孟、夏几人出来，这几位代表便都被捕。几位同学也义无反顾地出来一同前去。保安队要把几人推到一起，有一过路人某认识李散人，向他说话，便也一同“押”送到警察厅。反动当局当时妄想用高压手段，扑灭爱国运动的火焰。

孟震侯先生在汉文《泰晤士报》任职，关于天津爱国运动情况，连续报道，并用“震侯”署名发表言论。被押在警察厅时，《泰晤士报》的熊少豪伴同英人前去看望，这是中外舆论的一种表态。杨以德对先后拘留的代表，不管心中多么忌恨，却也不得不出面“谈话”，买好，妄图分化。《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各书，已多详细记载，不再赘述。在一次抗议绝食斗争中，孟震侯是和时子周作代表和杨以德交涉的。尚墨卿（后改名武，字公权）被警察加了个名号为“尚车子”（意谓架出去“上车”出“红差”，自后都背地称为“尚车子”），便在胸前挂纸条写“杨梆子”，因而被押入拘留所。杨以德气极败坏，火冒三丈，时、孟据理力争。我曾听吴世昌说，孟好诙谐，对杨辩解说外号不是辱骂，“人不得外号不富嘛”，使杨以德啼笑皆非。绝食斗争得到胜利，不出几天便从警厅移送地方检察厅。

在被押期间，孟震侯被推掌握“同难”的生活，并也负责娱乐活动，编话剧、说相声。演剧没有“服装”，围上床单当裙子。吴世昌学兄说，当时大家情绪旺盛，大说大笑。看守的警察，也在外观看。孟说话诙谐，1928年春天，我到《华北新闻》任事，北洋军阀濒于绝境，马、孟、时、刘等都住在租界。吴世昌结婚，孟在一天晚上到华北新闻社，见到吴世昌连说“宴尔宴尔”，表面是在祝贺。吴微笑不已，后曾对我说“这大年纪了，还如当年那样好说笑话。”

孟震侯先生后来离开了《泰晤士报》，为《新民意报》撰稿，据说一度与人经营印刷事业。我曾与先生长子广九，在原天津市教育局同事。他对其少年时家庭和美，生活比较松裕，时常感慨。孟先生由于续娶后时有齟齬，加以生活负担较重，患高血压症，腿脚说话，逐渐缓慢；起初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刘铁庵和马、时并联

络刘激清、杨宝慈各位教界人士，组织话剧社，几乎每年要在国货、信品所演出，孟积极赞助。我那时正在中学上学，就已未见孟演出过（孟广九上过台）。到1928我和吴世昌见到他时，说话已不利落，腿脚已显然露出病象了。

进入30年，孟震侯先生便难再外出，卧病在家。在旧社会没有家产，“住鞭干哇”的人家，一旦失业，没有收入便生活窘困。1932年初夏，孟震侯先生逝世，赖挚友帮助殓葬。我也曾去送殓、送葬，见那萧索的家境，不觉慨然。

周恩来同志的《检厅目录》在《新民意报》发表，单行本未能及时印出。1926年由孟震侯交印刷局刊印，并为作序。

关于王钟声烈士事迹的一些补充

王钟声烈士在津进行革命活动，被直督陈夔龙杀害，是在辛亥（宣统三年）旧历十月十二日被捕的。那时武昌已首义，袁世凯“起复”，清王朝也已开党禁了，所以烈士在被捕时就根据九月初九日开党禁的“上谕”，进行质问，使得清吏不能进行审讯。本来，逮捕烈士的是探访局，那是杨以德“南段警察总办”属辖的，逮捕后陈夔龙指示送交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彼时“镇”总兵尚未改称镇守使）办理，于是解到西门外疙疸洼军营进行军法审讯的，第二天就执行死刑。王烈士就义时所以痛骂陈夔龙、张怀芝和杨以德，正是因为这三个奴才为清清杀害了不少革命义士。

由于革命浪潮的冲激，清室被迫宣布开党禁。王钟声烈士被杀害，受到舆论的指责。陈夔龙作贼心虚，所以官方发表文告和消息，说什么“讯系造谣生事，意图乘机扰乱”，并说：“除暴安良”，“决不忍稍有株连”，“切勿轻听谣言”；探访局也不得不给《大公报》写信，辩说什么“以逆解回籍之罪，竟敢招摇聚众秘会，必系欲乘乱煽惑，扰乱治安”，“按匪徒捕拿”，实在是越描越黑。陈夔龙在十月十四日给清内閣民政部“盐”电说：“拿获匪棍七人，内有王钟声一名煽惑起事”，“即日处死”。正说明他们对革命汹涌浪涛“起事”的恐惧。

• 岳丹 •

天津解放四十周年

金汤桥上红旗飘

河北区界内天津解放战役史实综述

王者师

[编者按] 天津解放，至今已整整四十年了。为了纪念天津解放四十周年，我们组织撰写了“金汤桥上红旗飘”，《炮火声声迎解放》两篇文章以飨读者，如能引起大家缅思，则是所至望。

1948年，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解放了东北全境，根本改变了解放战争中的力量对比。敌人惊魂未定，我东北野战军即以迅雷之势，乘胜挥师入关，连陷昌黎、唐山等地；同时，我华北兵团亦攻克新保安、张家口两个战略要地，全歼守敌两个军部，九个师，形成了对北平和天津守敌的战略包围。平、津守敌如惊弓之鸟，蜷缩在平、津两地，惶惶不可终日。

天津城区被永定、大清、子牙、南运、北运等河流分割成许多地块，地形异常复杂，是易守难攻的水网地带。天津守敌早在1947年，就凭藉这一有利条件，构筑了一整套城防工事。这条“城防外围防线”全长82华里，南北直径25华里，东西直径10华里。并沿防线建筑了一道高3.5公尺，下宽7公尺，顶宽1公尺的土围墙，墙内修建宽5公尺的交通道，墙外开挖了一条宽12公尺，深2.5公尺的“护城河”。此外，还在城区内外构筑了380个大碉堡和以大碉堡为依托的地堡群。为了形成环城防的开阔地，敌人竟不顾人民的死活，将四郊五里之内的民房拆除烧毁，使整个城市与外地的交通隔绝，仅留下设重兵把守的12个门。现金钟河大街与津蓟公路相接处的民权门，就是当年城防12个铁栅门之一。天津守

敌拼凑了10个师、4个特种兵团及地方部队，约13万余人的兵力，妄图依仗所谓“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负隅顽抗。

1949年1月1日，人民解放军在天津前线指挥部作战会议上，决定了解放天津的作战方针和具体部署。根据天津城区南北长，东西窄和天津守敌兵力部署情况，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完成了参战的解放军5个纵队又2个独立师，以及炮兵、坦克、高射炮部队的兵力部署。在津东一线，由我7纵(44军)、8纵(45军)担任主攻；西线由1纵(38军)、2纵(39军)担任主攻。东线主攻部队以45军135师为主攻师，在民权门至大毕庄一带构筑阵地，确定以民权门为突破口，直插金汤桥；133师为助攻师，对铁路工人宿舍东南角实施突破任务后，与友邻部队攻击前进至金汤桥，与从西面进击的兄弟部队胜利会师，共同实现解放天津的战役目标。

1月4日，打响了肃清天津外围的战斗。为了保证攻击部队的运动，在各突破地域挖了一条宽1米，深1.5米，长达5000余米的交通沟，有的交通沟已深入到距城防50米处，强化了对天津守敌的包围。

该日上午，国民党天津市参议会参议员丁作韶等4人，经国民党军方批准，出城防东门到达解放军指定地点，接洽和平实现停火。受到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接见。

1月5日，为使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战争损失，我天津前线司令部发表《告华北国民党将士书》。指出：只有放下武器全军投降，才是唯一出路，解放军将一律给予宽大待遇。但敌人拒绝放下武器，天津守敌司令官陈长捷还狂妄叫嚷“效法斯大林格勒战术，逐屋抵抗”、“与阵地共存亡”。为此，我军加强了天津外围的战斗，并命令炮兵部队对敌重点目标实施准确的轰击。

天津党的地下组织，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大量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和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以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名义派出人员，与各阶层人士接触，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对稳定情绪，保护资财，防